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BY JOHN KING FAIRBANK & FRANK A. KIEMAN

[美] 费正清 小弗兰克·A. 基尔曼 | 著 陈少卿 | 译

古代中国的 战争之道

后浪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美] 费正清 小弗兰克·A. 基尔曼 | 著 陈少卿 | 译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BY JOHN KING FAIRBANK & FRANK A. KIEMAN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北京 ·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 (美)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美) 小弗兰克·A. 基尔曼
(Frank A. Kierman, Jr.) 编著; 陈少卿译.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8
书名原文: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ISBN 978-7-5139-2309-5

I. ①古… II. ①费… ②小… ③陈… III. ①军事史
— 中国—古代 IV. ①E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0323号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Edited by Frank A. Kierman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opyright© 197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Ginkgo (Beijing)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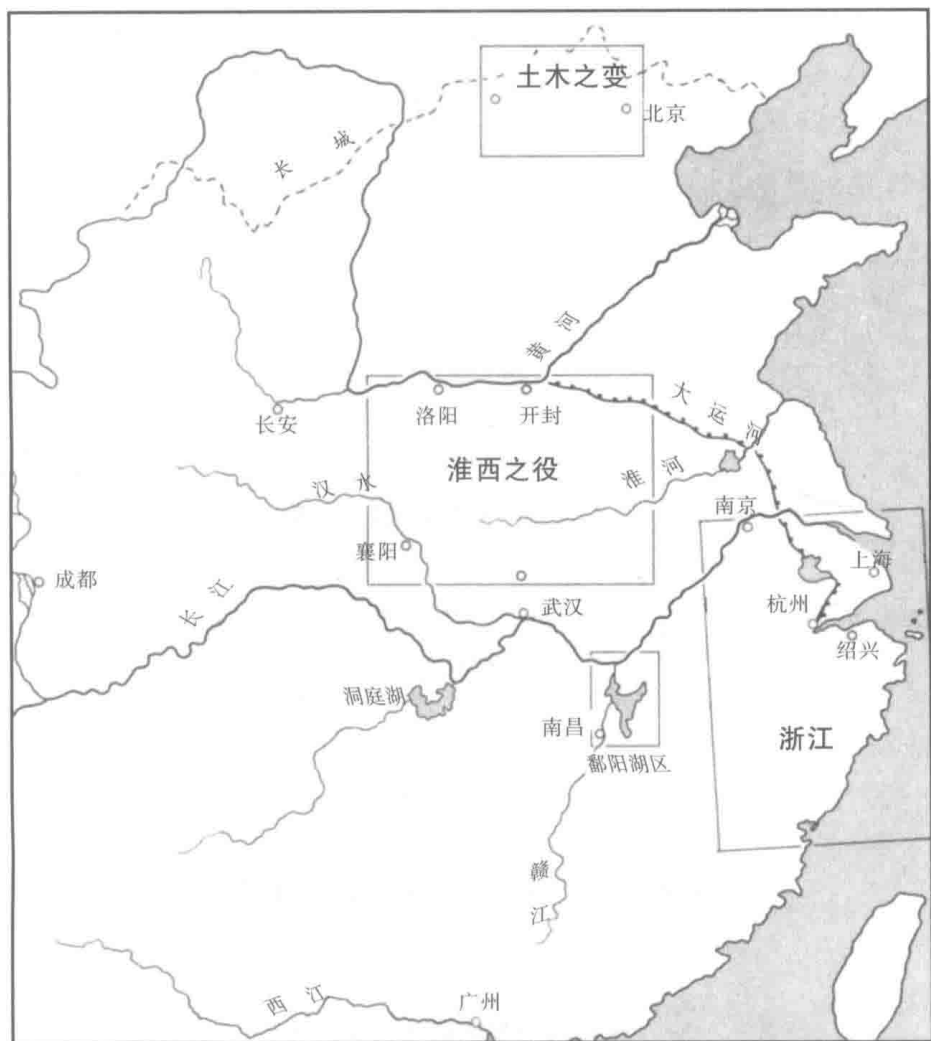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登记号：01-2019-1760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GUDAI ZHONGGUO DE ZHANZHENG ZHIDAO

出版人 李声笑
著者 [美] 费正清 小弗兰克·A. 基尔曼
译者 陈少卿
特约编辑 林立扬
责任编辑 王 颂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封面设计 徐睿绅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2309-5
定 价 68.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本书涉及的军事事件位置示意图

致 谢

十年前就有世界多地的学者为中国军事史的研究鼓与呼，然而总体而言，这门学问仍然乏人问津。1963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就在哈佛大学召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探索性会议。会上，罗荣邦教授应邀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军事的导论性文献综述。1965年召开了关于明代政府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主办、贺凯(Charles O. Hucker)先生出面组织。与会者强烈建议尽快召开军事史的研讨会。随后，芮沃寿(Arthur F. Wright)任主席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邀请小弗兰克·A. 基尔曼(Frank A. Kierman, Jr)出面，并在贺凯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两位先生的协助下，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1969年8月24日至29日，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会议在戴德姆(Dedham)麻省理工学院的恩迪考特中心(Endicott House)召开。

会议为期一周，内容不单单围绕着本书中收入的文章的早期版本，还有其他的口头或书面报告。以下诸位学者也是我们衷心感谢的：密歇根大学的张春树，哥伦比亚大学明代传记历史工程的房兆楹，法国陆军准将、前法国驻华武官纪业马将军(General

Jacques Guillermaz), 卫斯理大学的詹姆斯·米林杰教授 (James Millinger), 从华盛顿赶来的中国台湾陆军中将蔡文治, 前美国陆军上校威廉·惠特森 (William Whitson), 理查德·L. 约翰斯顿 (Richard L. Johnston), 韦德·威尔基森 (Wade Wilkison)。

我们全体人员都要感谢杨教授的巨大的贡献, 这一点在致辞中也表达了。我们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 (Frederick W. Mote) 和迈阿密大学的爱德华·L. 德雷尔 (Edward L. Dreyer) 给予这些论文上的机会。作为主编我们当然也很感谢彼此和本书的各位作者。

费正清

小弗兰克·A. 基尔曼

1973年3月

目 录

致谢 5

导言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

先秦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

小弗兰克·A. 基尔曼 (Frank A. Kierman, Jr.) 31

汉武帝的征伐

鲁惟一 (Michael Loewe) 75

藩镇抗拒朝廷：淮西之役 (815—817)

毕德森 (Charles A. Peterson) 135

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

傅海波 (Herbert Franke) 169

1363 年鄱阳之战：明朝开基的内陆水战
爱德华·L. 德雷尔 (Edward L. Dreyer) 223

1449 年土木之变
牟复礼 (Frederick W. Mote) 263

胡宗宪平徐海，1556 年
贺凯 (Charles O. Hucker) 299

出版后记 334

导 言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中国对今日世界的诸多贡献中，最乏人问津的要数它独特的军事经验。本书的研究范围，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 632 年，止于公元 1556 年，其目标主要是用细腻的分析，呈现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

如今 20 世纪下半叶行将过半，控制战争规模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本书的出现显得恰逢其时。国家或政权间的暴力冲突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共同威胁。如果想借鉴军事史去应对现在的危机，那么必须重视中国人战与和的经验。西方扩张的余波在越战中达到某种顶点，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战争方式的扩张性弱于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新的动员和防御艺术的突出范例。作为核大国，中美被一个同样的难题困扰：如何驾驭新兴的核力量，用它自卫，而不被它反噬？双方都需要用尽可能全面的视角看问题。

正如沃尔特·米里斯 (Walter Millis) 十年前所说：“继续将过去的战史套用到未来，不但可能，甚至必然造成一个文明的灾难。”

他说，亨利·哈勒克将军(Henry Halleck)、G. F. R. 亨德森(G. F. R. Henderson)、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J. F. C. 富勒(J. F. C. Fuller)等人，并不比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高明到哪里去。他说，军事史必须“少研究一点过去的战例……少一点纯军事视角，多一点文化视角……多运用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还要利用应用科学提升研究水平。”^①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独到经验也许会有特别的启发。

中国参与新的国际秩序是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必须为此做出调整。研究中国人的战争之道，可以使这种调整更顺畅。这样一来，理解中国军事传统就有了实用价值，中国政府正是它的嫡派传人。同时，我们还可以去粗取精，为我所用。毕竟中国历史是人类共同遗产。

中国的军事传统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实效，还在于它每每能够推陈出新，有时创造力甚至更胜西方。中国人不仅发明了弩、铸铁、火药，还发明了纸、印刷术、科举和职业文官制度。他们还有一项很早就取得的成就：确立文主武从的观念。因此，中国“和平主义”的名声在西方民间经久不衰。中国古史中兵制和战功的记载之多，前现代民族中无出其右者。公元前221年，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定于一统，其后的十二个主要朝代，和其他十六个次要朝代，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的。可谓“刀剑里面出政权。”统一一方

^① Walter Millis, *Military History* (Washington D. C.,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61)。这部著作博大精深，却没有提到亚洲的情形。大多数军事史的研究著作都是如此。例如 Edward Mead Earle, ed., *Make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面要靠武力，一方面也要靠非军事因素，这些因素军事史家也不能忽视。

本书分析了从古至今中国军事经验的典型形式：春秋时礼仪化的战争、战国时兼具礼仪和计谋的战争、汉代的内亚问题、唐代对藩镇势力的镇抚、明代沿海的倭患、围城战与内陆水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当权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军事灾难。当然，这些战例都可以同其他地区的战例横向比较，且能得出丰硕的成果。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然而其中一些方面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文与武：军事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如果注意到统一中国必须面对种种复杂的地形条件，那么我们将愈加钦佩这一成就。乔治·克雷西（George Cressey）是一位游踪广布的地理学家，他将中国的山脉比作“青藏高原上伸下来的手指”^①。几条大河沿着这些山谷东流，使得这些山脉更难逾越。然而还有其他南北走向的山脉，它们把地形横截成一个个孤立的台地或盆地。例如，四川的成都平原是一个很早就得到人工灌溉的鱼米之乡，四周崇山环绕。从北面的陕西入川要经过重重关隘，从东面入川要乘船穿三峡，溯江而上。这简直是上天为割据势力准备的天堂。福建的河谷和广东的沿海平原也与此类似，前往中原都要翻山越岭。西南的云南和西北的山西也都是峻岭环绕的台地。一般来说，中国的几个经济人口中心之间的距离要远于欧洲国家之间的距离。空间维度上，中国比美、俄等新兴巨头更加广袤；时间维度

^① George Babcock 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4), p.38.

4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上，中国甚至比欧洲更古老。不得不说，单单靠暴力，永远不足以统一这样一片文化多元、历史各异、地理隔绝的广大地域。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三角洲的路途并不比欧洲北部平原更平坦，但是欧洲北部平原多国并立，中国却保持着统一。一言以蔽之，统一中国不仅需要兵马饷械，更需要政治军事的想象力和社会组织的天才，军事力量只是补充而已。

从地理上看，西方的扩张性源于希腊罗马对海洋的利用，它孕育出远洋贸易、殖民地和地中海帝国，比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早了两千年之久。欧洲帝国主义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扩张性，最终掌握了世界霸权。相比之下，中国的防御性源于华北平原封闭的地理环境，它远离其他文明中心，也远离通向它们的海路。中国对安定内政的渴望压过了开疆拓土的雄心。欧洲有克里特制海权、特洛伊战争、雅典海军和腓尼基海洋贸易，而中国却少有类似的成就。中华帝国统一发展了一千年之后，与邻近的东南亚的贸易才渐形重要起来。又过了一千年，中国人“下南洋”蔚成风潮；然而，下南洋的部分原因是欧洲人的鼓动，他们出洋乘坐的是欧洲船只，进入的也是欧洲殖民地。有一种观点值得借鉴：今天西方扩张的特殊活力逐渐枯竭的时候，中国对内部社会组织的特殊兴趣也可能同时枯竭了。

文主武从，并不是修史的文人向壁虚造的。相反，这是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大成就。怎样让军人服从现有的社会秩序？今天，美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技术都在突飞猛进，这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这是考察中国军事史首先要注意到的一点。

从历史分期上讲，我们可以将中国军事史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公元前 221 年之前，此阶段战争愈演愈烈；第二阶段是前 221 年之后，这一阶段中国已进入帝制时期，特点是武力钳制。先秦中国对秩序和统一的追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一百五十个诸侯国渐渐兼并成十几个，又经过激烈的混战，只剩下七八个大国。前 221 年，列国终归一统。

在这五百年中，从公元前 722 年到前 481 年的二百五十年称为“春秋”^①，当时的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鄙视武力，因为战争的胜利是衡量统治者价值的最终标准。^② 战争只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史书上还记载着很多外交活动：建立、承认或灭亡国家；派遣使节或人质；占领或割让土地；引渡罪犯；调解争端；协同救荒；通过临时的盟会或约定结成同盟，有些同盟目的在于限制战争。^③

公元前 403 年到前 221 年的两个世纪战乱频仍，史称“战国”。这一时期战争愈发激烈，组织愈发完备，战况愈发残酷，参战国的实力愈发雄厚，技术愈发先进。最近一项研究认为，春秋时期“不下一百一十个国家”被灭亡或吞并，只有二十二个生存到了战国时代^④。进入战国后，国家的数量还在急剧减少。大约战国中期，弩应用于实战；前 4 世纪中叶，铁开始用于兵器制造。^⑤ 与此同时，征

① 对于春秋与战国的起止时间，学界似无定论。国内有观点认为，公元前 770 年至前 476 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 475 年至前 221 年为战国时代。——编者

② 见本书小基尔曼的文章《早期中国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

③ 入江啓四郎：《中国古典と国際法》（東京，成文堂，1966）。较早的研究可参看 Richard L. Walker, *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Hamden, Conn. Shoe String Press, 1953)。

④ Cho-yun Hsu,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59.

⑤ 想总体上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技术，请参见 Joseph Needham and other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Press, 1971)。这部多卷本著作最新出到第四

发的军队规模更大、训练更精。士兵听从统一号令，协同作战，职业军人担任指挥。这些职业将领不再措意于繁文缛节，而是专心于沙场胜负。步卒取代了贵族的戎车。论述战略战术的兵书开始出现，最著名的便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到前320年之间，时至今日仍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思想。^① 中原人很快又从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引入了骑战技术，同时还引入了裤子，方便骑手跨坐在马背上。但是马镫还没有出现。

关于作战指挥的艺术，以及战争的手段和目的，前辈战略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孙子兵法》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将这些智慧总结提炼了出来。和同时代的《孟子》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孙子兵法》重视扰乱对手的心神、打乱对手布置，它明显同早期儒家一样，认为精神状态是人间万物的首要因素。虽然帝制时期“换了人间”，但同其他生逢乱世的战国子书一样，《孙子兵法》流传到了后世（公元前221年之后两千年的军事史应该如何恰当地分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秦始皇的统一带来了内战永久终结的曙光。“统一”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因为它带来内部的安定，这是繁荣和文明生活的前提。安定还意味着思想的统一。正统思想是治国的法宝，汉代前期，朝廷转而尊奉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及其弟子。由此形成的帝制时期的儒学，吸纳了法家等其他学派思想，是一个混血儿。假如孔子复生，恐怕会被这种儒学吓一跳。无独有偶，罗马教廷的思想基础也不单是耶稣的教义，而是融合了众多源于其他宗教和社

卷第三部分《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

① Samuel B. Griffith, trans, *Sun Tzu: The Art of W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毛泽东的战术原则也受到了《孙子兵法》的影响。

会的思想。汉代正统观念对战争是鄙夷的，这种鄙夷因此获得了道德基础，中国思想从此打上了轻武的烙印。接下来的研究要厘清汉宋两代的文官主导权的差异。宋代士大夫的主导权有理学的加持，更臻成熟完善。

这样一来，中国正统观念中的理想社会，是于家于国都等级森然的社会。这一秩序的本质是一些人理所当然地高高在上，另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身居下位。“父”和“君”居于“家”和“国”的顶端，占据支配地位。维系儒家社会的“三纲”则要求“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

为了维持这一来之不易的秩序，中国人采取了多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样等级森严。最高等且最可取的手段是“教化”。扎扎实实地灌输圣贤之道，让每个人都能深入理解伟大的“社会风俗的准则”（即“礼”，礼仪、行为准则），从而各守本分，各安其业。当教化失效，尤其对于没有良好教养的下等人，就要用次一等的手段——“刑赏”，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统治者根据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施以奖惩。儿子殴打父亲要问斩，而父亲杀死不孝子是无罪的，除非手段特别残忍。因为孝道是社会的基石。^①

在这个规范性结构中，军事在第三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当教化和刑赏已经不足以挽救乱局，军事则是最后的撒手锏。如果君主树立了崇德向善的风气，国家与社会机构运转良好，诸如战争等大规模的暴力强制则不再必要。

孔孟之教素来不推崇外在的强制。儒家认为，君子是一个人自

^① 关于律法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参见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t.1.

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君子应该能不借助暴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观念是出于一种乐观的信念：君子的嘉言懿行能够感化旁人，旁人因此承认君子的道德权威。端正的言行本身就能化作权力。所以，在正确的时机以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不仅维系着文明化的人际关系网络，还确定了一个人在其中的地位。

对于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余一人”，尤其如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诉诸武力等于承认自己没能用圣人之道施政，等于承认了文治的失败。所以，军事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需要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正当性。

在这里潜藏着中国传统中的绥靖倾向。战争很难有什么光荣可言，因为理想上来说，它就不该发生。道德的绝对准则都是在和平一边的。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以使战争显得正当，没有富裕的邻邦吸引中国盗贼穿过边境或越过海洋去劫掠。正如顾立雅(Herlee G. Creel)所言，^① 对外征战成为罗马的主要产业，而中国一直不强调征战的光荣。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样的榜样可供崇拜或效仿，西方的英雄崇拜在中国年轻人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最多可以找到一个罗宾汉式的偶像——三国时期(222—280)的诸葛亮。所以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神圣战争”，同样很难找到复仇的上帝或者震怒的耶和华。中国道德的价值不是由一个支持你、并且随时准备消灭异教徒的神祇赋予的。中国的世界观并不像《旧约》或伊斯兰教那样有着强烈人格化的神，也不那么好战。

武力的地位降低，内政外交的地位同样降低，它们其实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皇帝居于一系列辐射状的影响区域的中心。如果他英

^① He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1: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明仁厚，以德服人，自然会获得权威。皇帝的榜样从文明秩序的中心照临四方，不仅直接治下中国的臣民应当臣服，连中国周边的异族君长也要臣服，虽然影响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① 结果就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域外，一切以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有他的一份责任。两种情况都被视为叛逆，因为它破坏了应有的秩序。1840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意图用武力改变广州贸易体制，中国人也将他们称为“逆”，这种“逆”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而是针对以北京为中心的这个文明，而英国本身也是这个文明边缘上的一员。

这一套出于儒家之手的约束武力的规范性理想，是否比耶稣的“登山宝训”更管用，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它比基督教更加注重既成秩序，因为它认为和平是惠及每一个人的，而受压迫者的暴力反抗对谁都没好处。行为合乎秩序的理想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破坏这个理想有可能导致整个宇宙系统的崩溃。结果是，在中国“反抗权利”的正当，不能靠个人或集体自由来证明。要反抗必须以整个社会秩序为借口，宣称君主没有充分而正确维护社会秩序，天命已失。末世昏君的形象就是这个原则的一例。^② 是他昏庸无道才使得天下大乱，反抗因而获得了正当性。反叛者往往以社会秩序的名义起事，它既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合法化的神话，也暗地里为一切诉诸武力的行为提供道德正当性。

① 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见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② 关于末代昏君的刻板印象的研究，见Arthur F. Wright: "Sui Yang Ti", in A. F. Wright, ed., in *Confusio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62ff.。